

外部需求、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曾 帅 罗长远 李 铮*

摘 要：外部需求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相关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掘。本文基于理论建模，并利用 2000—2020 年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外部需求扩张降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缩小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水平的差距，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该效果在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越好的地区越显著。此外，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多体现在普通雇员、大企业、以中低收入国家需求为主导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

关键词：外部需求；劳动折价；劳动收入份额

DOI： 10.13821/j.cnki.ceq.2026.01.07

一、引 言

对外开放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尚未就此达成一致的观点。本文拟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monopsony power)^①的角度，为该问题提供一个较新的观测窗口。若企业拥有劳动力市场势力，便可将工资压低至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以下，使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偏低(Manning, 2021; 解恩泽和余淼杰, 2024)。既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普遍拥有劳动力市场势力，是压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Brooks et al., 2021; Pham, 2023)。外部需求扩张可以改善预期利润，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加剧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竞争程度，从而有利于限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Cui and Li, 2023; Hoang et al., 2024)。外部需求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今后也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关键角色。聚焦于中国现实，本文旨在识别外部需求是否可通过削弱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而提升劳动收

* 曾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李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罗长远，上海市国权路 60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65643708；E-mail: chyluo@fudan.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22VRC154)、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24EJL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5YJC79000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725B2014)的资助。作者感谢第八届国际经济学前沿论坛、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24 年年会与专家及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出于简便，本文统一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势力”称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是指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作为买方，拥有对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定价权，常用的衡量指标是劳动折价。与之不同，已有文献中常提及的企业在产品市场势力是指企业在产品市场中作为卖方，拥有对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常用的衡量指标是成本加成率。

入份额。

外部需求、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和劳动收入份额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2000—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中找到一些初步线索,具体见图1。由图1(a)可知,行业出口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揭示外部需求越高的行业,其劳动收入份额越大。同时,劳动折价(labor markdown)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劳动折价指的是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水平的偏离程度,劳动折价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劳动者在分配中越处于弱势地位。由图1(b)可知,行业出口与劳动折价呈负相关,表征外部需求越高的行业,其劳动折价越低。由上述事实来看,可能存在“外部需求扩张—劳动折价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这一逻辑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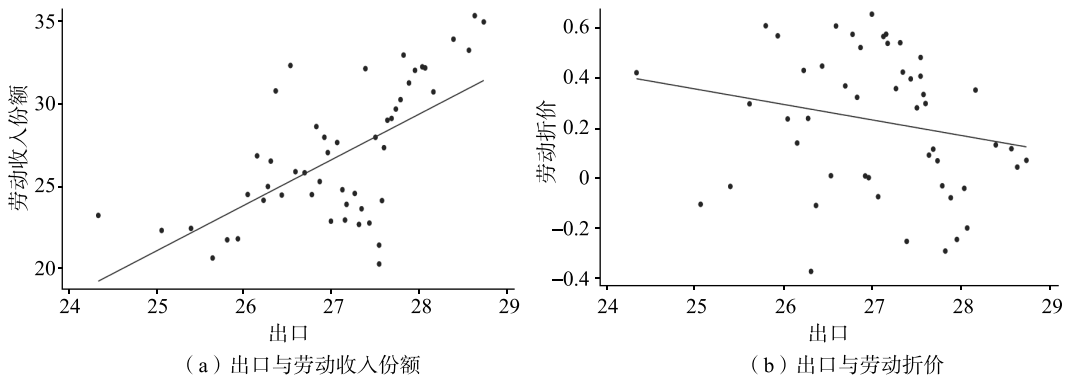


图1 行业出口与劳动收入份额和劳动折价的关系

注:劳动收入份额和劳动折价的数据来自国泰安和 Wind 数据库,经计算得到。出口即行业出口金额的对数值,来自 CEPII-BACI 数据库。利用 Stata 中的 binscatter2 命令画图。

需要注意的是,外部需求是否可以充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还取决于市场环境。如果当地市场的进入壁垒较高,市场环境较为严苛,外部需求扩张可能无法有效促进企业进入(Cui and Li, 2023),“外部需求扩张—劳动折价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这一逻辑链条的前半段就可能断裂。聚焦于中国现实,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是两个值得考虑的市场因素。首先,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是市场活力最基础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汪殊逸等, 2024)。作为企业生存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暗礁”,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会严重阻碍企业发展。^①其次,融资成本是新企业设立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初创企业通常自有资金不足,需要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虽然我国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实践,但融资环境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不少企业在融资时仍面临困境。2025年2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继续下大气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优化融资环境、改善企业融资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数字金融扩展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有助于

^① 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2024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也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就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40条具体举措。

帮助初创企业跨过资金约束门槛,促进创新创业活动(谢绚丽等,2018)。^① 鉴于优化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又在外部需求压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在考察外部需求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时,有必要分析其效果是否依赖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起“外部需求扩张—劳动折价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逻辑链条,随后利用2000—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并基于引力方程构造外部需求的工具变量,实证考察外部需求如何通过劳动折价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研究发现:第一,外部需求扩张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第二,劳动折价是外部需求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渠道。外部需求扩张可以促进企业进入,降低劳动折价,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外部需求充分降低劳动折价会使样本期内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1.05个百分点。第三,在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越好的地区,外部需求扩张越能压低劳动折价,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第四,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多体现在普通雇员和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上,以及以中低收入国家需求为主导的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中。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两支,第一支主要关注全球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全球化可以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比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从而拉低本国劳动收入份额(Grossman and Oberfield, 2022)。还有研究发现,外包和出口会影响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但影响程度随技能水平和职业任务的不同而异(Hummels et al., 2014; Hummels et al., 2018)。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间接地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刘亚琳等,2022)。比如,国际贸易可能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或劳动者议价能力,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Ahsan and Mitra, 2014)。特别地,有学者指出企业的市场势力也是将全球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的重要渠道。传统上,学者关注较多的是企业的产品市场垄断势力(De Loecker et al., 2020),通常将劳动力市场视为完全竞争的结构。然而,近年来有研究指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普遍拥有垄断势力(Berger et al., 2022),会直接使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压低劳动收入份额,这意味着难以实现按照劳动者贡献参与初次分配的政策目标。本文从劳动折价这一较新的视角考察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思考如何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和共同富裕,对这支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

第二支主要关注全球化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劳动折价)的关系。全球化可以通过雇主集中度影响劳动折价。首先,雇主集中度被认为是产生劳动折价的重要原因(Benmelech et al., 2022)。如果劳动力市场中作为雇主的企业数量较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削弱,减少了劳动者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供强需弱”导致企业拥有较强的买方垄断力量(张子尧等,2023)。聚焦至中国情景,Brooks et al.(2021)认为雇主集中度可以解释中

^① 202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鼓励“金融机构充分运用内外部数据和大数据技术对科技型企业全景画像,提升客户筛选和营销对接效率,促进金融服务触达更多初创期、成长期企业”。

国企业为何拥有劳动力市场势力。Pham(2023)和张子尧等(2023)也从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数量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动。其次,不少研究基于进口贸易的视角,发现了全球化影响劳动折价的证据。Benmelech et al.(2022)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迫使美国部分企业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雇主集中度上升,压低了工资水平。Pham(2023)则基于中国加入 WTO 的准自然实验,发现与最终品进口关税下降不同,中间投入品关税下降增加了企业的预期利润,促使更多企业进入市场,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主集中度,削弱了企业的劳动折价水平。然而,上述文献局限于关注进口贸易对劳动折价的影响,也未将研究进一步延伸至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此,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结合理论建模,分析外部需求扩张如何通过劳动折价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为理解全球化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和中国案例。

就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Hoang et al.(2024)的研究与本文最为相关,他们考察了出口扩张对越南企业劳动折价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特别是 Hoang et al.(2024)相比,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就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这支文献而言,目前鲜有研究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角度进行探讨,国际上也仅有 Hoang et al.(2024)基于越南的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本文聚焦于中国现实,考察外部需求对企业劳动折价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不仅对关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也为国际上关注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势力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互动关系的文献提供了中国案例。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与 Hoang et al.(2024)借助传统的古诺模型不同,本文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出发,引入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考察外部需求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联系。同时,与 Hoang et al.(2024)依赖特定的外生政策冲击不同,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构建外部需求敞口,基于引力方程构造工具变量来识别因果关系,具有相对灵活的应用性。最后,本文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进一步考察了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对于外部需求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调节作用,强调了国内市场改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协同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为推进对外开放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本部分借鉴 Macedoni and Tyazhelnikov(2024)的思路,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着重考虑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构建起“外部需求扩张—劳动折价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理论逻辑。

(一)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假设一个两国模型,本国 H 和外国 F , 国家 $j(=H, F)$ 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_j = \left(\sum_{\Omega} x_j(\omega)^{\frac{\sigma-1}{\sigma}} \right)^{\frac{\sigma}{\sigma-1}}, \quad (1)$$

其中, $x_j(\omega)$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 ω 的消费量, Ω 为可消费的产品集合。 $\sigma > 1$ 为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后可得:

$$x_j(\omega) = E_j p_j(\omega)^{-\sigma} P_j^{\sigma-1}, \quad (2)$$

其中, E_j 为 j 国的总消费, $p_j(\omega)$ 为产品 ω 的价格, $P_j = (\sum_{\Omega} p_j(\omega)^{1-\sigma})^{\frac{1}{1-\sigma}}$ 为总体价格指数。

(二) 劳动力市场

参考 Cao et al.(2023) 和 Macedoni and Tyazhelnikov(2024) 的设定, 假设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逆劳动供给函数为:

$$\omega = L^\gamma = (\sum_f L_f)^\gamma, \quad (3)$$

其中, L_f 为企业 f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L 为本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 假设劳动力不可跨国流动, 均衡时劳动总需求等于劳动总供给。 γ 为总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式(3)意味着企业面临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买方垄断势力。

根据定义, 劳动折价等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与工资水平的比值, 一般情况下其表达式为^①:

$$\eta_f \equiv \frac{MRPL_f}{\omega} = \frac{\omega'(L)L_f + \omega}{\omega} = \frac{\omega'(L)L}{\omega} \frac{L_f}{L} + 1 = \gamma s_f + 1, \quad (4)$$

其中, $MRPL_f$ 为企业 f 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 $s_f = L_f/L$ 为企业 f 所占的雇佣份额。由式(4)可知, 劳动折价一方面取决于总劳动供给弹性, 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佣份额。在 γ 保持相对恒定时, 企业所占的雇佣份额 s_f 越小, 企业劳动折价水平越低, 意味着其买方垄断势力越弱。结合式(4)及劳动边际产出价值 $MRPL_f$ 的表达式, 劳动收入份额 LS_f 可做如下表示:

$$LS_f \equiv \frac{\omega_f L_f}{P_f Y_f} = \frac{\omega_f}{P_f} \frac{L_f}{Y_f} = \frac{\theta_f}{\eta_f \mu_f}, \quad (5)$$

其中, $\theta_f = \frac{\partial Y_f}{\partial L_f} \frac{L_f}{Y_f}$ 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mu_f = P_f / MC_f$ 为成本加成率。由式(5)可知, 劳动折价 η_f 与劳动收入份额 LS_f 为负相关关系。其背后的经济学直觉是: 当劳动折价越大时, 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势力越强, 企业在劳动产出价值中抽走的份额就越大, 归属劳动者的报酬份额也就越小。另外, 还可以看到, 成本加成率 μ_f 也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 后续实证分析会把成本加成率作为控制变量。^②

(三) 企业利润最大化

假设本国企业 f 只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 生产每单位产品需要雇用 c_f 数量的劳动力。企业 f 可以在国内 H 销售, 也可以出口至国外市场 F , 贸易的冰山成本为 τ_j , 设定

① 限于篇幅, 关于劳动折价表达式的推导过程请见附录 I,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 官网 (<https://ceq.ccer.pku.edu.cn>) 下载。

② 本文重点关注外部需求影响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而非产品市场势力的原因请见附录 I。

$\tau_H = 1, \tau_F > 1$ 。如果企业 f 向 j 国销售的产品数量为 x_{fj} ，那么企业 f 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量为 $L_{fj} = \tau_j c_{fj} x_{fj}$ ，可变成本为 $w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

假设企业在进入市场时还需要付出固定成本，而固定成本的高低与当地的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若营商环境较好，那么企业付出的固定成本较低，反之则反是。固定成本用 $F(\vartheta_f)$ 表示。其中， ϑ_f 表示企业 f 面临的营商环境， ϑ_f 越大表示营商环境越友好。进一步设定 $F'(\vartheta_f) < 0$ ，意味着营商环境越友好，固定成本越低。此外，由于自有资金的限制，企业必须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以支付固定成本^①，那么企业还需要付出融资成本。在考虑融资成本后，企业需要向银行偿还的金额可以表示为 $\rho_f F(\vartheta_f)$ ，其中， $\rho_f > 1$ 代表企业 f 面临的融资环境。当地的融资环境越友好， ρ_f 越小，融资成本越低。

由此，企业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pi_f = \sum_{j=H,F} p_{fj} x_{fj} - w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 \rho_f F(\vartheta_f). \quad (6)$$

在开放条件下，本国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为 $\sum_f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根据式(3)，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均衡时，劳动总供给应当等于劳动总需求，所以本国工资 $w = \left(\sum_f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right)^\gamma$ 。式(6)可以表示为：

$$\pi_f = \sum_{j=H,F} p_{fj} x_{fj} - \left(\sum_f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right)^\gamma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 \rho_f F(\vartheta_f). \quad (7)$$

将式(2)代入式(7)，并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企业对产品的最优定价为：

$$p_{fj} = w \tau_j c_{fj} \frac{(\sigma - (\sigma - 1) \alpha_{fj})}{(\sigma - 1) (1 - \alpha_{fj})} (1 + \gamma s_f), \quad (8)$$

其中， $\alpha_{fj} = \frac{p_{fj}^{1-\sigma}}{\sum_{j=H,F} \sum_f p_{fj}^{1-\sigma}}$ ， $s_f = \frac{\sum_{j=H,F} \tau_j c_{fj} x_{fj}}{\sum_f \sum_{j=H,F} \tau_j c_{fj} x_{fj}}$ 表示企业 f 在本国劳动力市场中所占

的雇佣份额。将 α_{fj} 代入式(2)还可以得到 $x_{fj} = E_j \alpha_{fj} / p_{fj}$ 。进一步结合式(7)和式(8)，可以得到市场均衡时企业 f 的利润为：

$$\pi_f = \sum_{j=H,F} E_j \alpha_{fj} \left[1 - \frac{B_{fj}}{(1 + \gamma s_f)} \right] - \rho_f F(\vartheta_f), \quad (9)$$

其中， $B_{fj} = \frac{(\sigma - 1) (1 - \alpha_{fj})}{(\sigma - (\sigma - 1) \alpha_{fj})}$ 。将式(4)和式(5)代入式(9)，并根据零利润条件，可得：

$$\sum_{j=H,F} E_j \alpha_{fj} \left[1 - \frac{B_{fj} \mu_f}{\theta_f} LS_f \right] = \rho_f F(\vartheta_f). \quad (10)$$

由式(10)可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外部需求 E_F 越大，企业 f 的劳动收入份额 LS_f 越大。据此提出假说1：

假说1 外部需求扩张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① 延续贸易与金融互动关系文献的经典设定(Fan et al., 2015)，假设企业的融资行为是为了覆盖进入市场时的固定成本，而可变成本由自有资金来覆盖。 $\rho_f - 1$ 可以视为企业的借款利率。

结合式(4)、式(5)和式(10),还可发现外部需求通过压低劳动折价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据此提出假说2:

假说2 外部需求扩张可以压低劳动折价,从而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进一步地,根据式(10)并考虑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对上述结论的调节效应,可以提出假说3^①:

假说3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可以强化外部需求扩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

三、研究设计

本部分介绍研究方案的设计,包括计量模型设定、主要变量构造以及数据样本。

(一) 模型设定

为考察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

$$LS_{f(k)t} = \alpha_0 + \alpha_1 EXE_{kt} + \gamma Controls_{ft} + \lambda_f + \lambda_t + \epsilon_{ft}, \quad (11)$$

其中, f 表示企业, k 表示企业所在的行业, t 表示年份。 $LS_{f(k)t}$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 EXE_{kt} 是核心解释变量,为 k 行业在 t 年的外部需求敞口。 α_1 是本文感兴趣的估计系数,若 α_1 显著为正,则表明外部需求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Controls_{ft}$ 为控制变量。 λ_f 和 λ_t 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ϵ_{ft} 为回归误差项。回归分析时,本文将标准误差聚类在行业-年份层面(Ma and Ruzic, 2020)。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

参考肖土盛等(2023),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劳动收入份额(LS)=劳动报酬/要素成本法计算的增加值

=劳动报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

其中,劳动报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经计算,样本期内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均值约为26.72%,与肖土盛等(2023)的结果相似。

2. 核心解释变量:外部需求敞口

现有研究往往通过构造贸易敞口(trade exposure)来识别全球化的经济影响。基本逻辑是:基于实际的贸易流量构造出行业或地区维度的贸易敞口后,再使用工具变量识别因果关系。本文构造行业层面的外部需求敞口如下(Dauth et al., 2021)^②:

$$EXE_{kt} = \frac{Export_{kt}}{W_{k,t0} L_{k,t0}}, \quad (12)$$

其中, $Export_{kt}$ 为中国的行业 k 在 t 年的出口额, $W_{k,t0} L_{k,t0}$ 为行业 k 基年的工资总额。

① 限于篇幅,假说2和假说3的详细阐释请见附录I。

② 限于篇幅,在行业层面构建外部需求敞口的原因请见附录II。

式(12)使用工资总额作为分母,反映的是单位工资所创造的出口额,能较好地捕捉外部需求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3. 工具变量

基于式(11)的回归可能还存在内生性问题,主要是由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例如,除外部需求外,可能存在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或制度条件等因素的变化,既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又会影响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使 α_1 的估计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基于引力方程构造工具变量,以识别外部需求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因果关系。基本逻辑是:利用各国进口需求的信息,通过引力方程回归,拟合出只由各国的需求变化引发的中国对外出口额,如此便剥离掉了中国国内供给能力等干扰因素的影响。这样既能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对中国而言又是一个外生变量,满足排他性的要求。引力方程中进口国需求常用进口国的GDP衡量。但Li(2021)指出,使用进口国的GDP构造出的工具变量仍不够外生,并给出了基于自然灾害构造工具变量的改进方法。一般而言,自然灾害会损害该国的经济活力,从而影响该国对外国产品的需求。而且,一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外生变量,与中国国内的供给能力等干扰因素无关。本文借鉴该方式构造了工具变量。^①

4. 控制变量

首先,本文选择了一组反映企业基本特征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肖土盛等,2023),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企业上市年龄(加1后取自然对数值)、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本文还控制了一组可能混淆“外部需求扩张—劳动折价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逻辑链条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技术进步、成本加成率和劳动者议价能力。^②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参考王雄元 and 黄玉菁(2017),本文做了如下处理:(1)考虑到出口活动的参与主体是制造业企业,本文只保留属于制造业的企业样本;(2)剔除金融保险类、ST类企业;(3)剔除雇佣人数小于100人的企业样本;(4)剔除可能存在数据错误的样本,包括劳动收入份额大于1或者小于0的样本,以及高管平均薪酬低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企业样本;(5)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在上下1%水平上进行缩尾。最终,本文获得了21 265个企业-年份维度的有效样本,包含2 093家企业。

构造外部需求敞口需要使用到中国出口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其中,中国出口数据来自CEPII-BACI数据库,并加总至ISIC Rev.3两位数层面。 W_{k,t_0} 、 L_{k,t_0} 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工企数据可获得的最早年份为1998年,所以设定 $t_0=1998$,并将工资总额加总至ISIC两位数层面。出口额和工资总额均使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构建工具变量需要使用世界各国自然灾害数据,该数据来自EM-DAT数据库,它详

^① 限于篇幅,工具变量的构造方法请见附录II。

^②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定义请见附录II。

细记录了各国1900年至今发生的自然灾害信息,包括自然灾害的类型、发生时间、死亡人数等。构建工具变量所需的其他数据,如双边贸易流量、各国总人口数等则来自CEPII数据库和WDI数据库。^①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首先根据基准回归方程,考察外部需求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估计结果

表1汇报了基于式(11)的估计结果。列(1)—(2)展示了OLS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2)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 EX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初步佐证外部需求扩张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列(3)—(4)展示了2SLS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阶段回归中 EXE_{IV}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F值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段回归中 EX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揭示在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外部需求依然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假说1得到验证。以列(4)为代表性估计结果,平均而言,外部需求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便上升1.56个百分点,与样本均值相比上升幅度为5.84%。如无特殊说明,后续均报告以 EXE_{IV} 为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

表1 基准估计结果

	OLS		2SLS	
	(1)	(2)	(3)	(4)
EXE	0.0379*** (0.0063)	0.0250*** (0.0040)	0.0406*** (0.0070)	0.0252*** (0.0044)
第一阶段回归(被解释变量: EXE)				
EXE_{IV}			0.5214*** (0.0378)	0.5204*** (0.0379)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 265	21 265	21 265	21 265
一阶段F值			189.7588	188.5041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EXE 为以工资加权构建的行业外部需求敞口指标, EXE_{IV} 为基于引力方程构造的工具变量。下表同。

① 限于篇幅,主要变量和自然灾害的描述性统计请见附录II。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基准估计结果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外部需求敞口的衡量方式；二是，更换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式；三是，更换工具变量；四是，控制反映参与国际循环其他维度的变量；五是，控制更多固定效应；六是，调整标准误的聚类层级；七是，排除外部需求结构性变化对基准估计结果的干扰。经过上述处理后，外部需求敞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佐证了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①

五、机制分析

本部分首先考察外部需求如何通过劳动折价这一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随后进行简要的反事实分析。

（一）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的影响

在使用 ACF 方法对生产函数进行分行业估计后，便可计算得到企业的劳动折价水平(Brooks et al., 2021)。^② 经计算，本文所使用的企业样本的劳动折价均值约为 1.85。根据已有文献，中国企业的劳动折价均值在 1.13—2.29(Brooks et al., 2021; Pham, 2023; 解恩泽和余淼杰, 2024)，本文的测算结果也在这个区间之内。企业劳动折价水平为 1.85，意味着劳动报酬相较边际产出价值存在 45.95% 的折扣。^③

为考察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的影响，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劳动折价的对数值(记为 $\ln Markdown$)，估计结果见表 2。其中，列(1)是 OLS 回归，列(2)是 2SLS 回归。可以看到，外部需求敞口 EX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外部需求扩张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折价，削弱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根据列(2)，平均而言，外部需求每增加 1 个标准差，企业的劳动折价便降低 5.09%。^④ 此外，参考 Cao et al.(2023)，本文使用 GNR 方法估计生产函数，重新测算劳动折价(记为 $\ln Markdown1$)。同时，考虑到使用上市公司数据估计生产函数可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还直接使用解恩泽和余淼杰(2024)所测算的各行业的劳动产出弹性和中间品产出弹性估算劳动折价(记为 $\ln Markdown2$)。由表 2 的列(3)和列(4)可知，对于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劳动折价， EXE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进一步地，将 $\ln Markdown$ 引入基准回归方程的右侧，估计结果见表 2 的列(5)。可以看到， $\ln Markdown$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企业的劳动折价水平越低，其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同时，列(5)中 EX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绝对值的大小较基准估计结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请见附录 III。

② 限于篇幅，劳动折价的测算方式及特征事实请见附录 IV。

③ $(1.85-1)/1.85 \times 100\% \approx 45.95\%$ 。

④ $[e^{0.0008 \times 62.0121} - 1] \times 100\% \approx 5.09\%$ 。

果(0.0252)有所下降^①,佐证劳动折价是外部需求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渠道,假说2得到验证。

表2 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的影响

	lnMarkdown	lnMarkdown	lnMarkdown1	lnMarkdown2	LS
	OLS	2SLS	2SLS	2SLS	2SLS
	(1)	(2)	(3)	(4)	(5)
EXE	-0.0006**	-0.0008**	-0.0029***	-0.0008**	0.0169***
	(0.0003)	(0.0003)	(0.0005)	(0.0003)	(0.0028)
lnMarkdown					-10.1036***
					(0.19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 262	21 262	19 869	21 262	21 262
一阶段 F 值		188.3425	191.6637	188.3425	188.2365

注:lnMarkdown、lnMarkdown1、lnMarkdown2 分别为使用 ACF 估计、GNR 估计和已有文献中的要素产出弹性计算的劳动折价,LS 为劳动收入份额。下表同。

根据理论分析,外部需求改变劳动折价的关键在于促进企业进入,加剧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为进一步夯实该理论逻辑,本文补充两个证据:一是外部需求是否可以促进企业进入,二是外部需求是否通过加剧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而压低劳动折价。

首先,通过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得到各行业每年新注册企业的数量的对数值(记为 *Entry*),并利用 EXE 对其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3 的列(1)—(2)。可以看到,不管是 OLS 还是 2SLS 回归,EXE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征外部需求扩张有助于新创企业进入。其次,如果外部需求通过加剧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来压低劳动折价,可以预期,在劳动力市场雇主竞争较小的行业,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的压低作用应该更明显。行业内劳动力的 HHI 指数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雇主竞争程度的衡量指标(Benmelech et al., 2022)^②,HHI 指数越小,意味着行业内雇主集中度越低,劳动力市场的雇主竞争程度越大。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计算 2000 年各行业的 HHI 指数后,行业可分为雇主竞争程度较小(HHI 大于中位数)和雇主竞争程度较大(HHI 小于中位数)两组。分组回归的结果见表 3 的列(3)—(4),可以看到,列(3)的 EX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列(4)的

^① 此处做法类似于中介效应检验。需要指出的是,江艇(2022)对中介效应模型的滥用提出了批评,强调机制分析应以诸如表 2 列(2)—(4)的回归为主要论据,但同时指出可以将列(5)的回归作为一种试探性的证据。也有学者指出,江艇(2022)主要是批评缺乏以理论分析为基础的中介效应检验,相较而言,建立在严谨理论分析之上的检验更具可靠性(毛捷等,2022)。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严格推导了劳动折价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此外,近期也有文献采取了与本文类似的论证方式(Ma and Ruzic, 2020)。

^② 行业内劳动力市场的 HHI 指数为: $HHI_k = \sum_f s_f^2$, 其中 s_f 为企业 f 在所属行业 k 所占的雇佣份额。

EXE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进一步参考 Li(2021)的做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经验 P 值为 0.04,揭示两列的估计系数具有显著差异,外部需求对劳动折价的压低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期雇主竞争较小的行业,与预期相符。

表 3 外部需求与企业进入和雇主竞争

	Entry		lnMarkdown	
	OLS	2SLS	雇主竞争小	雇主竞争大
	(1)	(2)	(3)	(4)
EXE	0.0185*	0.0279**	-0.0009***	0.0002
	(0.0090)	(0.0113)	(0.0003)	(0.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43	243	13 248	8 014
一阶段 F 值		76.0331	165.2074	1 056.172

注:Entry 为各行业每年新注册企业的数量的对数值。前两列的标准误聚类至行业层面。

(二) 反事实分析:外部需求对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果

本小节尝试量化外部需求通过降低劳动折价对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并利用反事实分析完成这一目标(杜鹏程等,2021;Kondo et al., 2024):通过对比外部需求维持初始状态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情况与现实劳动收入份额的情况,大致测算出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首先,基于式(13)计算出外部需求保持初始状态下(即维持 2000 年的水平)劳动折价的反事实水平:

$$Markdown_{it}^{\text{反事实}} = \exp(\ln Markdown_{it}^{\text{现实}} + |coef^{IV}| \times (EXE_{kt} - EXE_{k,2000})), \quad (13)$$

其中, $|coef^{IV}|$ 为表 2 列(2)中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其次,根据 Brooks et al.(2021)的模型推导,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

$$\frac{1}{LS} = \frac{\sum_k \sum_f Labor_income_{fk}}{\sum_k \sum_f Value_added_{fk}} = \sum_k \sum_f \eta_{fk}^L \frac{\mu_{fk}^M - \theta_{fk}^M}{\theta_{fk}^L} \omega_{fk}^L, \quad (14)$$

其中,LS 为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Labor_income_{fk}$ 为行业 k 中的企业 f 的劳动报酬, $Value_added_{fk}$ 为企业 f 的增加值, η_{fk}^L 和 μ_{fk}^M 分别是企业 f 的劳动折价水平和成本加成率, θ_{fk}^M 和 θ_{fk}^L 分别是中间投入产出弹性和劳动要素产出弹性, ω_{fk}^L 为企业 f 的雇员人数占宏观层面雇员总人数的比例。基于式(14),代入现实数据,可以计算出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如果将式(14)中的 η_{fk}^L 替换为式(13)中的 $Markdown_{it}^{\text{反事实}}$,就可以计算出在外部需求保持初始状态下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

图 2 展示了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了现实情况和反事实情况下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现实情况中,上市制造业企业在宏观层

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这与近年来文献的发现相一致(刘亚琳等,2022)。根据反事实情况,如果外部需求敞口维持初始状态不变,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现U形变化,但其绝对值均小于现实情况,这反映出外部需求扩张可以拉升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根据计算,现实情况下2000—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在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幅度比反事实情况下的增长幅度高1.05个百分点。换言之,在外部需求充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情况下,劳动折价下降会使得宏观劳动收入份额额外增长1.05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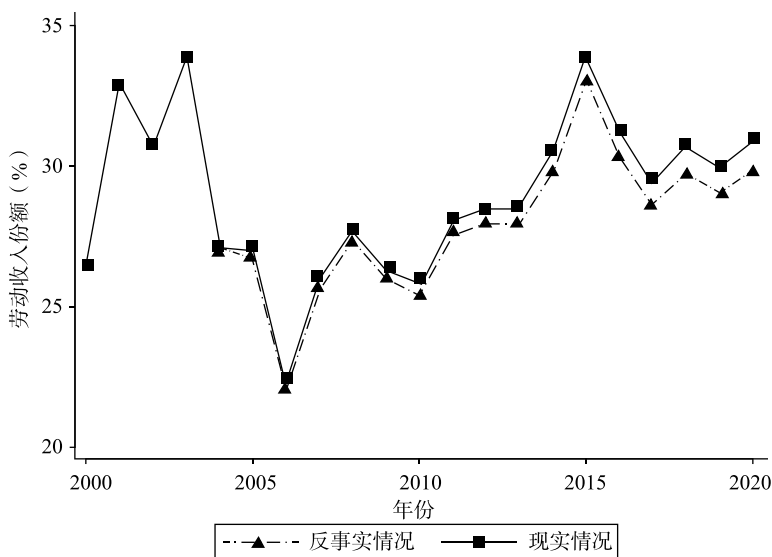


图2 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反事实模拟结果

注:基于式(14),并利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计算得到。使用Stata中的tway命令画图。

六、拓展性分析

本部分将进行一系列的拓展性分析,首先讨论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的调节作用,随后分别从员工类型、企业规模、外部需求类型等方面考察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一) 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的调节作用

根据假说3,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可以强化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背后的逻辑在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有利于降低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的固定成本,从而有助于充分发挥外部需求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削弱作用。

为此,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右侧分别加入EXE与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营商环境的衡量是基于樊纲等学者编制的市场化指数^①。融资环境的刻

^① 具体可见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https://cmi.ssap.com.cn/>)。

画是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借鉴汪殊逸等(2024)的做法,分别计算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均值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然后根据中位数构造虚拟变量 *Market* 和 *Digital_Finance* (大于中位数取值为 1, 否则为 0)。估计结果见表 4, $EXE \times Market$ 和 $EXE \times Digital_Finance$ 对劳动折价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征在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越好的地区, 外部需求越能够压低企业的劳动折价并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假说 3 得证。

表 4 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的调节作用

	营商环境		融资环境	
	<i>lnMarkdown</i>	<i>LS</i>	<i>lnMarkdown</i>	<i>LS</i>
	(1)	(2)	(3)	(4)
<i>EXE</i>	0.0006 (0.0009)	-0.0090 (0.0123)	0.0026*** (0.0007)	-0.0137 (0.0098)
$EXE \times Market$	-0.0015* (0.0008)	0.0361*** (0.0114)		
$EXE \times Digital_Finance$			-0.0035*** (0.0007)	0.0405*** (0.00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 262	21 265	21 262	21 265
一阶段 F 值	92.8157	92.9103	95.6345	95.7355

注: *Market* 和 *Digital_Finance* 分别为表征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是否大于地区中位数的虚拟变量。

(二) 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本小节从以下维度考察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一是, 考虑到企业对高管和普通雇员的买方垄断势力可能有所差异, 所以关注了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变化; 二是, 考虑到“超级明星企业”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基于企业规模考察了异质性影响; 三是, 鉴于本文的出发点是高水平对外开放, 所以从出口目的国和行业要素密集度两个角度对外部需求类型作进一步的考察, 这可为如何推进高水平开放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①

表 5 展示了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列(1)—(2)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拆分为高管劳动收入份额(*LS_manager*)和普通雇员劳动收入份额(*LS_worker*)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外部需求扩张主要提升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

列(3)—(4)分别利用总资产和营业总收入代理企业规模, 根据样本期内企业规模均

^① 限于篇幅, 详细的异质性分析请见附录 V。

值的中位数,构造了虚拟变量 $Size_cap$ (总资产大于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和 $Size_rev$ (营业总收入大于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将其与 EXE 交乘后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 $EXE \times Size_cap$ 和 $EXE \times Size_rev$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揭示外部需求扩张对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

列(5)–(6)分别以各行业在样本期内对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的中位数构造虚拟变量 $Developing$ (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占比高于中位数取值为0,否则为1)和各行业在样本期内的资本密集度均值的中位数构造虚拟变量 $Labor$ (资本密集度高于中位数取值为0,否则为1),再将这两个虚拟变量与 EXE 交乘后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 $EXE \times Developing$ 和 $EXE \times Labor$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在那些以中低收入国家需求为主导的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5 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

	员工类型异质性		企业规模异质性		外部需求异质性	
	$LS_manager$	LS_worker	LS	LS	LS	LS
	(1)	(2)	(3)	(4)	(5)	(6)
EXE	-0.0006 (0.0004)	0.0228*** (0.0061)	0.0189*** (0.0055)	0.0094* (0.0056)	0.0319*** (0.0052)	-0.0044 (0.0097)
$EXE \times Size_cap$			0.0096* (0.0056)			
$EXE \times Size_rev$				0.0227*** (0.0065)		
$EXE \times Developing$					0.0686*** (0.0231)	
$EXE \times Labor$						0.0258*** (0.00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 602	19 602	21 265	21 265	21 265	21 265
一阶段 F 值	77.0035	77.0035	91.8399	77.6070	111.3779	89.2593

注: $LS_manager$ 和 LS_worker 分别为高管和雇员收入份额; $Size_cap$ 和 $Size_rev$ 分别为表征企业总资产和总收入是否大于中位数的虚拟变量; $Developing$ 和 $Labor$ 分别为表征对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和资本密集度是否高于行业的中位数的虚拟变量。

七、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协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首先,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外部需求扩张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并且更加有利于普通雇员

和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这说明外部需求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还可以提高普通员工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以及有效遏制大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走低的倾向。因此,需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从而改善初次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其次,营商环境和融资环境是外部需求削弱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调节因素。因此,需要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大力发展数字金融,降低企业主体进入市场的制度性成本和融资约束,从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此外,拓展性分析显示,来自不同国家或者不同行业的外部需求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有所差异,这意味着将来在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循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时,应该有所侧重,比如特别关注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或者劳动密集行业的外部需求。

参 考 文 献

- [1] Ahsan, R. N., and D. Mitr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s Slice of the Pie: Evidence from Indian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08, 1-16.
- [2] Benmelech, E., N. K. Bergman, and H. Kim, “Strong Employers and Weak Employees: How Does Employer Concentration Affect Wag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22, 57(S), S200-S250.
- [3] Berger, D., K. Herkenhoff, and S. Mongey, “Labor Market Pow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4), 1147-1193.
- [4] Brooks, W. J., J. P. Kaboski, Y. A. Li, and W. Qian, “Exploitation of Labor? Classical Monopsony Power and Labor’s Sh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0, No.102627.
- [5] Cao, J., E. Xie, and M. Yu, “Monopsony Power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 *SSRN Working Paper*, 2023.
- [6] Cui, C., and L. S. Z. Li,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New Firm E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3, 163, No.103093.
- [7] Dauth, W., S. Findeisen, and J. Suedekum, “Adjusting to Globalization in German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1, 39(1), 263-302.
- [8] De Loecker, J., J. Eeckhout, and G. Unger,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 561-644.
- [9] 杜鹏程、徐舒、张冰,“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改革的经济效应”,《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2—158页。
- [10] Fan, H., E. L. C. Lai, and Y. A. Li, “Credit Constraints,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2), 390-416.
- [11] Grossman, G. M., and E. Oberfield, “The Elusive Explanation for the Declining Labor Shar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2, 14, 93-124.
- [12] Hoang, T., D. Mitra, and H. Pham, “Export Market Expansion, Labor-Market Power, and Labor Shares: Evidence from a Small Open Economy”, *Working Paper*, 2024.
- [13] Hummels, D., R. Jørgensen, J. Munch, and C. Xiang, “The Wage Effects of Offshoring: Evidence from Danish Matched Worker-firm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 1597-1629.
- [14] Hummels, D., J. R. Munch, and C. Xiang, “Offshoring and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8, 56(3), 981-1028.
- [15]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第100—120页。

- [16] Kondo, I., Y. A. Li, and W. Qia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Labor Monopson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Working Paper*, 2024.
- [17] Li, J.,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Trade Specialization Patterns and Work-Related Gender No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1, 128, No. 103407.
- [18]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 《经济学》(季刊), 2022 年第 5 期, 第 1467—1488 页。
- [19] Ma, L., and D. Ruzic, "Globalization and Top Income Sha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5, No. 103312.
- [20] Macedoni, L., and V. Tyazhelnikov, "Oligopoly and Oligopson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57(2), 401-429.
- [21] Manning, A., "Monopsony in Labor Markets: A Review", *ILR Review*, 2021, 74(1), 3-26.
- [22] 毛捷、郭玉清、曹婧、徐军伟, "融资平台债务与环境污染治理", 《管理世界》, 2022 年第 10 期, 第 96—118 页。
- [23] Pham, H., "Trade Reform, Oligopsony, and Labor Market Distor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3, 144, No. 103787.
- [24] 汪殊逸、袁从帅、刘志阔, "税制改革、营商环境与市场活力:兼论改革协同作用", 《世界经济》, 2024 年第 1 期, 第 3—29 页。
- [25] 王雄元、黄玉菁,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年第 4 期, 第 135—154 页。
- [26] 肖土盛、董启琛、张明昂、许江波, "竞争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年第 4 期, 第 117—135 页。
- [27] 解恩泽、余森杰, "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改善了么? ——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角度的分析", 《管理世界》, 2024 年第 6 期, 第 92—117 页。
- [28]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8 年第 4 期, 第 1557—1580 页。
- [29] 张子尧、黄炜、丁相元、尹恒,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世界经济》, 2023 年第 12 期, 第 167—196 页。

External Demand, Monopsony Power, and the Labor Sha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ZENG Shuai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UO Changyuan* LI Zhe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External demand is an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labor share in China, ye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mand on the labor

* Corresponding Author: LUO Changyuan,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No. 600 Guoquan Road,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21-65643708; E-mail: chyluo@fudan.edu.cn.

sh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down. We find that the external demand expansion can increase the labor share by lowering labor markdown.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xternal demand on labor share is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better business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s. Moreov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xternal demand on the labor share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among rank-and-file employees, large firms,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sectors driven by demand from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Keywords: external demand; labor markdown; labor share

JEL Classification: J30, J42, F16